

第三章、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的特色與精神

第一節：王驥德校注《西廂記》的分析

一、王驥德校注《西廂記》的動機

若依照林宗毅對於晚明《西廂記》評點的發展看法，將當時的評注方式分爲二：一是屬於鑑賞性系統，如王世貞、徐渭、李贄、湯顯祖與陳繼儒；另一爲學術性系統，包括王驥德與凌濛初²³。

王氏校注《西廂記》之構想，實始於童年，自述：

自王公貴人，逮閨秀里孺，世無不知有所謂《西廂記》者。顧由勝國抵今，流傳既久，其間為俗子庸工之篡易而失其故步者，至不勝句讀。余自童年輒有聲律之癖，每讀其詞，便能拈所紕繆；復扼拿而恨，故為盲瞽學院妄夸箋釋，不啻嘔穢，而卻付之烈炬也。²⁴

王氏大約卒於天啓癸亥秋冬至甲子季春之間（西元 1623~1624 年），此書完成於卒前十年，亦可謂其窮畢生之力完成此一宿願。其箋釋方式，採「逐套注，即附列曲後，一便披閱」²⁵，其非單純之箋注而已，乃屬較深入之解證。在本文之後，卷六收有唐宋以來詩詞及題跋諸文等雜錄，略加整理，可大致分爲以下幾大主題：

（一） 關於元稹的資料：

王銍〈元微之年譜〉

宋祁《唐書·元稹傳》（節文）

唐·白居易〈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義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志銘〉

唐·韓愈〈唐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志銘〉

唐·范攄〈微之繼婚河東裴氏夫人事略〉

（二） 關於鄭恆、崔氏的資料：

²³ 請參考林宗毅《『西廂記』二論》，頁 155。

²⁴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頁 2。

²⁵ 同注 1, 〈例〉，頁 8a。

- 秦貫〈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
- (三) 關於元稹、白居易、沈亞之酬唱詩詞：
元稹〈古決絕詞〉、〈夢游春〉十七首等
唐·白居易〈和微之夢遊春百韻詩〉
唐·沈亞之〈酬元微之春詞〉
- (四) 關於〈會真記〉、〈鶯鶯歌〉及相關詞曲：
元稹〈崔娘本傳〉
唐·李紳〈鶯鶯歌〉
唐·王渙〈惆悵詞〉
宋·秦觀【調笑令】
宋·毛滂【續調笑令】
宋·趙令畤【蝶戀花詞】
明·楊慎【黃鶯兒詞】
- (五) 關於崔鶯鶯畫像的考證和題詠：
元·陶九成〈崔麗人圖跋〉
明·唐寅〈題崔麗娘像詩〉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詩〉
- (六) 關於〈會真記〉、《西廂記》的考證：
宋·王銍〈傳奇辯正〉、〈元王實甫、關漢卿考〉
劉麗華〈題詞〉²⁶。

由以上可見，整個校注本實際上是對唐、宋以來與《西廂記》相關資料的總結與拓展，也回應了人們曾提出的各種疑義。王氏將《西廂記》之研究深化，並引向一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可說是建立了「西廂學」的體系。而身為王驥德曲友彷彿在數百年前亦意識到這一點，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序〉中即云：

抑崔氏于王，故有夙緣，自實甫始倡豔辭，性之繼伸宏辯，至伯良以窮蒐冥解之力，踵成兩君子之緒，……。

王氏校注《西廂記》之功，具有繼往開來的關鍵地位，除了箋注內容的深度不同於其他單純的箋注本外，其實從以下兩段文字，可以清楚比較出校注刊印者動機的不同：

如弘治金台岳家《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訂奇妙注釋西廂記》中〈牌記〉²⁷：

²⁶ 引自林宗毅，《西廂二論》，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同時參見蔣星煜《明刊本西廂記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7月），頁135。

嘗謂古人之歌詩，即今人之歌曲。歌曲雖所以吟詠人之性情，蕩滌人之心志，亦關於世道不淺矣。世治歌曲之者，猶多若《西廂》曲中之翹楚者也。況閭閻小巷，家傳人誦，作戲搬演，切須字句真正唱與圖應，然後可。今市井刊行，錯綜無倫，是雖登壘之意，殊不便人之觀，反失古制。本坊僅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次大字魁本，唱與圖合。使寓於客邸，行於舟中，閑遊坐客，得此一覽，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命鈔梓刊印，便於四方觀云。²⁸

而《王本西廂》中王驥德的自敘則表明：

《西廂》、《琵琶》二記，一為優人俗子妄加竄易，又一為村學究謬施句解，遂成千古煩冤。余嘗取前元舊本，悉為釐正，且並疏意指其後，目曰「方諸館校注」。二記並行於世。吾友袁九齡嘗謂：屈子抱石沈淵，幾二千年，今得漁人一網打起。聞者絕倒。蓋二傳之刻，實多九齡慇懃之云。²⁹

王氏對待《西廂記》的態度是不涉及商業利益，且是相當嚴肅，以一個對曲律深有研究的學者身分為《西廂記》洗其「千古煩冤」，無形中將《西廂記》研究導入更深一層的境地。

二、王驥德校注《西廂記》的方法

以古本為底，乃是王驥德校注的根本方法。因此之所以將此本命名為《新校注古本西廂記》，「新」，乃是為了有別於「俗子庸工之篡易」之本而言，正因為當時流行的其他版本讓王氏深感「欲付之烈炬」，所以有必要將錯謬更正，將此本脫出其他俗本之列。「校注」包括校勘與注釋。由「訂正蓋從古本」³⁰可知，王氏所選擇的底本，乃是來自於前人流傳至今、值得採信之「古本」。對此，何謂古本？由他採用版本的看法，可見王氏的認知與理念：

碧筠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係前元舊本。……朱石津本，刻萬曆戊子較筠本間有一二字異同，則朱稍以己意更易。然字畫精好可翫，古

²⁷ 牌記，又稱墨圍、木記碑牌，是刻書家的字號標誌，反應刻書內容及相關情形，最初是為了便於讓讀者辨識，爭取商譽之用，後來見發展成版權的紀錄，有的還帶有今日廣告的意味。

²⁸ 弘治本，頁 161b。

²⁹ 明·王驥德，《曲律》，《中國十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11月），頁 181。

³⁰ 〈例〉，頁 1b。

本惟此二刻為的，餘皆訛本。今刻本動稱古本云云，皆呼鼠作朴，實未嘗見古本也，不得不辯。

訂正概從古本，間有宜從別本者，曰古作某，今從某本作某。其古今本兩義相等，不易去取者，曰某本作某，某本作某，今並存，俟觀者自裁。或古今本皆誤宜正者，直更定，或疏本注之下。³¹

沈璟在《王本西廂》卷六所附〈詞隱先生手札二通〉其二云：

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至千古之冤，舊為群小所竄，若眾喙所訾者，具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此卓識否也？³²。

沈氏大加稱譽的，正是王氏的校注有其重要價值在，其中，開創了「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也就是他校注《西廂記》之方法，亦即卓越識展現之所在。而且以方法學來看，這兩句的意義，可以互換解釋，即是經史、元劇皆可用以證故實、證方言。另外，王氏能靈活推敲異文的優劣，而不盲從單一版本。他留意到了《董西廂》與《王西廂》之間的微妙關係。雖然《董西廂》尚不能視為《西廂記》之祖本或別本，但正因為西廂故事大半情節承自《董西廂》，如此，在將說唱體裁轉為曲文時，雖風格不同、文采各異，但類似文字的移植，在潤飾上，常常有它的邏輯存在。

由於《王西廂》當中的遣詞用意，多帶有「隱語方言」，隨著時代變遷，為求當時的正確意義，親身進入王實甫的故鄉訪查探問，卻亦「瘡不能解」，不得已，「以意逆而一二方言不敢漫為揣摩，必雜證諸劇」，是王氏用心謹慎之處。而他之所以特別重視諸劇之間，隱語方言的通用可能具有同義之微妙關係，與自小的學習環境與習慣有很大的關係。他在〈自序〉中談到：

余家藏元人雜劇可數百種許，間有所會，時疏數語，又雜採他傳記，若諸劇語之足相印證者，漫署上方。久之，遂盈卷帙。³³

由以上可知，王驥德在校注《西廂記》時，盡其所能，從採用底本、而非坊間之徒沽名釣譽或牟取利益而已。雖然王氏校注本，並非完美無瑕，卻不掩其開創之功，在此之前，人們對於《西廂記》中的鄉語方言，常莫名其妙，流行的箋注本更是避而不注，或只是解釋一、二之後便以己意直釋，令人半信半疑。自從王氏校注本一出，一些一望可知的條目不再贅注，而一些以往不懂的隱語方言，

³¹ 〈例〉，頁 1a。

³² 引自《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六所附〈詞隱先生手札二通〉，頁 52b。

³³ 引自《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頁 4。

後繼者循著王氏提供的途徑，相互問難，以探蹟求真，此貢獻對後人影響甚大。

王驥德在《西廂記》校注史上，建立了「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的校注方法，這是單純箋注本所欠缺的³⁴，王驥德建立的校注方式，後繼者凌濛初、閔遇五、毛西河等人，無不受其影響，而後共同將評校《西廂記》推向學術化的道路，《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在校注史上亦成爲一種典範，其原則與方法，至今仍爲校注學者奉爲三尺³⁵，王驥德無疑是重要的開拓關鍵。這種以考證經書的態度與方法來校注《西廂記》，對於戲曲地位的提升，是莫大的肯定。

三、王驥德校注《西廂記》的目的

王氏〈自序〉中即明白揭櫫：「訂其訛者，芟其蕪者，補其闕者，務割正以還故吾」³⁶。於是，而爲達此目的，不論是以經史佐證、或以元劇證方言，都期望能夠恢復「故吾」，這也是明清兩代文人努力的目標。

王氏運用他本以校正的方法，其中引用次數最多者爲《董西廂》，共一百一十九次，占全部條目三百二十三條的百分之三十六，比例之高，遠勝於其他校本。顯示《董西廂》與《王西廂》在改編上的傳承關係十分密切，〈凡例〉更特別注明：「注中，凡曲語襲用董記者，雖單言片詞，必曰董本云云，以印所自出。」³⁷此一努力，隱然揭示王驥德的「西廂學」，企圖以《董西廂》上承〈鶯鶯傳〉，下啓《西廂記》，完成「西廂學」之主幹。

古代學者的推敲與修正，大體上是爲了溝通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情感交流。評點也好、序跋也罷，校注更不例外，都是爲了讀者閱讀劇本之需要而存在。因此，明代印刷術的發達，名家評本的「雨後春筍」，適足以反映當時對閱讀的渴求。那麼，評點學、序跋學、校注史的建立，就戲曲作品的研究，以及「文本」的傳達效果，無疑的，有其不容抹滅的價值存在。早期的弘治本只有單純的就典釋典的箋注文字，爾後如徐士範本和陳眉公本等逐漸在內容加上題評與音釋。若就其釋文內容而言，這三本，文字漸由冗長走向精簡，亦即所謂「文士化」。而歷代民間文學一經文人染指，往往就是它走向精緻化、高度發展的關鍵契機。《西廂記》校注本在這逐漸「文士化」的過程中，同時亦醞釀另一股「非爲俗子設」的解證潮流。若說陳眉公本等掛有名家頭銜的校注本，是十足商業化的噱頭產品，那麼自王驥德以降，則是將之推向學術化的重要人物。

³⁴ 先前有關《西廂記》的評注版本，著名的有弘治本、徐士範本、陳眉公本等。

³⁵ 引自林宗毅《西廂學四題論衡》，頁 211，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³⁶ 引自《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頁 2。

³⁷ 引自《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第 25 條。

由以上可知，《王本西廂》「非為俗子設」的解證內涵，不同於先前市場取向的所謂名家諸本，將誤解減低到最少、忠實再現原本，是王驥德致力的目標，希望讓讀者瞭解真正《西廂記》文學之美，繼續流傳，相信是王氏最終的期盼。因此，雖然不免俗地加入了插圖，若以王氏校注的目的來看，插圖必須要有助於瞭解文本，尤其要忠實傳達，但絕不能落於俗套，反倒破壞了整個校注的意義。這樣的理由，便成了他選取插圖版本的重要指標。